

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

冯惠玲

摘 要 信息化进程对于人类记忆是双刃剑,信息技术在强化社会生活记录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失忆现象,数字记忆成为新一代文化记忆。本文在简要爬梳数字记忆由来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记忆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价值,归纳出多资源互补、多媒体连通、迭代式生长、开放式构建等特点,从目标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编排展示、技术支撑五个方面提出构建数字记忆项目的架构和要领。本文还分析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在数字记忆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及其原因,倡导图档博机构在数字记忆构建中拓展职能,增加活力。参考文献 31。

关键词 记忆 数字记忆 文化记忆 图档博 记忆机构

分类号 G203

Digital Memory: A Digital Palace for Cultural Memory

FENG Huiling

ABSTRACT

Informatiz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to human memor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recording ability of social lif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led to a new phenomenon of social amnesia. Digital memory could be a new generation of culture memory.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echnic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logic, memory enters into the digital world rapidly and extensively. Digital memory has become a new generation of culture memory.

Since the 1990s, digital projects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main bodies and topic types are diversified. However, passions for practice are ahead of theoretical studies, which results in inadequacy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in digital memory research.

Digital memory is digitalized culture memor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specific objects is harvested, organized, stored and displayed in digital forms, and loaded, reproduced and spread online. Digital memory sh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resource, multimedia, iteration and open construction.

Digital memory are mostly constructed through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mainly comprises five aspects, target positioning,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editing and display, and technical support.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理论、方法与应用”(编号:16ZD158)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Theory,Method and Application”(No.16ZD158)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冯惠玲,Email:fhl@ruc.edu.cn,ORCID:0000-0003-4800-1259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ENG Huiling,Email:fhl@ruc.edu.cn,ORCID:0000-0003-4800-1259)

1) Target positioning is to determine the function, main body, form, style, audience and expectation of the project. 2)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ims to reveal and guard the spirit of the project. It includes understanding, excavation, textual research, sort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memory object, which is the bedrock of subject selection, 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esentation. 3) Resource integration is to gather resources of various types and forms related to the memory object for the purpose of supplement and verification and provide them for the public's reference. 4) Editing and displaying is to spread memory to more people and descendants, which has a direct effect on presentation of digital memory. Three elements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the scientific storage of memory resources,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full sha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user experience. 5) Technical support refers to the technical means applied in the project's demand analysis, system development, dai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s well as the harvest, processing, preservation, presentation and retrieval of resources. Technical support runs through the full life circle of digital memory projects.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are mainly in the form of documents such as books and archives, which involves social knowledge and emotions. Books and archives, among others, can play a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 memory and meanwhile are the main body of memory storage.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LAM) can spons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 memory and meanwhile are memory repository. The LAM should expand their functions and increase their vit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emory projects. 31 refs.

KEY WORDS

Memory. Digit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LAM. Memory repository.

0 引言

记忆与人类文明相伴,对个人而言,它是一切认知、情感、行为的源泉,对集体而言,是认同、归属、族群文化的基础。没有记忆,人类文明无以安放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生活在记忆中。记忆的含义、存在方式、建构机理和效能随社会演进而变化,人类为破解记忆奥秘、强化记忆能力所付出的努力从未停止。信息化浪潮孕育了数字记忆这一全新的文化记忆形态,迅速蔓延生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来不及细究它的来由、机理、特征和规律。

历史上很早就有专门人员或机构承担记忆构建和留存之责,进入数字时代,“记忆机构”得以显化和强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保存机构成为这个领域的一支主力。从历

史与逻辑的结合上解读数字记忆这一新兴文化现象现在还只能浅尝而难以深透,甚至会有一些误读误解,但对于这道现代文明传承应有之题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却毋庸置疑。

1 应运而生,渐成气象

1.1 抗击数字时代的社会失忆

人类社会发展越快,对于往昔的留恋越深。自20世纪20年代“集体记忆”概念提出之后,有关记忆的话题持续升温,逐步进入多个领域,“对于记忆的兴趣明显超出了时髦科学话题通常的繁荣期限”^[1]。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对记忆产生哪些影响,为人类开启怎样的记忆,成为新的话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强记忆的时代,如美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对于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打

破了。如今,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为常态。”^[2]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指出,人类从以往的废墟中攫取残余记忆的绝望尝试,“在载着记忆痕迹的数据库面前,一种鲜活的希望已经悄然而至,并呈现出将这种绝望进行消除的趋势”,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完善记忆将遗忘置于一种僵局”^[3]。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强遗忘的时代,如澳大利亚学者弗兰克·厄普沃德教授认为,多变的信息空间正在反常地制造一个崩溃的集体记忆^[4]。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指出,“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宇宙,人类正面临失去记忆的危险”^[5]。两种不同观点出自不同视角,并非完全对立。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文化记忆而言,信息化实为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系统日益强大的捕获、关联、复制、存储和传播能力,极大地提升了记录社会生活、强化社会记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的超载、碎片化、浅表化、短时化使当代人难以驾驭和准确提取,剧增的海量信息正在把人类传统的记忆体系击碎淹没。记忆的获取是在信息存储和提取对接的基础上实现的,当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提取更多地从固化的整体对象转为难以定型的碎片,从质量转向注意力快速转移的流量,从深读转向缺乏沉淀吸收的浅读,从注重识记转向无需复习的一键查询,大量信息从人读转向机读,从感悟原生文本知识要义的精读转向获得关系性结论的远读时,数字阅读、数字化生存就在人们“坐拥”并可实时查用海量信息的同时,冲淡了对既往事实的完整了解和对过去经验的深刻认知,如此,数字时代伴随海量信息存储而产生的巨大的遗忘感、失忆感,以致对个体和集体记忆的蚕食与解构就有了基本的解释。

数字时代需要获得与失忆抗争的能力,从思维逻辑看,有意识、行动和工具三个层面。在意识层,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失忆常常是无意识的,记忆则需要“有意图地与过去打交道”^[6];在行动层,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与“构建”“重构”相连的思想,指出“过

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构建的”^[7];工具层主要指媒介,信息常识告诉我们,数字时代的失忆症要用数字手段救治。这三层认识对接起来,就是要有意图地用数字手段来构建数字时代的记忆。从行为逻辑看,数字时代的记忆构建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是搬家,把现实世界的各种文化记忆从传统媒介向数字空间迁徙;二是再造,用数字方式生产和创建新记录、新记忆。两条路径并行交错,共同指向新的记忆媒介,“站在新的媒介技术的门槛上,过去时期的‘历史性’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1]477}数字记忆应运而生。

1.2 数字记忆兴起

在上述技术环境、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下,记忆快速并广泛地进入了数字世界。自1994年美国记忆启动以来,数字记忆项目在全球范围生长蔓延,建设主体和主题类型丰富多样,很快形成繁茂景象。其中网站类国家记忆项目有美国记忆、中国记忆、加拿大记忆计划、新加坡记忆、荷兰记忆、印度记忆、马来西亚记忆等;地区记忆项目有佛罗里达记忆、印第安纳记忆、缅因州记忆、纽约市皇后区记忆、北京记忆、香港记忆、上海年华、记忆四川等;社会组织记忆项目有大学记忆、企业记忆、乡村记忆、各类社群记忆等;重大事件记忆项目有911事件、西班牙内战、卡特里娜和瑞塔飓风、日本3·11大地震、波士顿大屠杀事件等,我国网民为这次新冠肺炎事件制作了2019nCovMemory网站,保持每天更新,四川大学未来档案实验室师生发起面向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交媒体信息存档项目;文化现象记忆项目有文字、方言、艺术、非遗、建筑、声音等;个人记忆项目包括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公民记忆,其中不少以口述等方式被包含在其他各类记忆项目之中。其中有些项目有交叉性,如“记忆四川”非遗主题网站就是地区和文化现象的交叉项目。社交媒体上有关记忆的项目更是不胜枚举,粗略搜索,仅以北京记忆为主题的微信公众号就有近百家,难以计数的个人

微博、微信中也记载了很多人生经历。2000年,美国西蒙斯学院教授 Ching-chih Chen 发起建设的全球记忆网(Global Memory Net),在早期关于中国秦始皇兵马俑的照片收藏基础上,汇集了80多个国家、超过2400个数字记忆集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建立了“失去的记忆”、“濒危的记忆”和“活动”等3个数据库进行记忆文献推广,还将一些珍贵记忆文献制作光盘保存和传播。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把回望与乡愁寄放于网络空间,数字记忆就这样悄然成风,渐成气象了。

总体看来,数字记忆的实践热度超前于理论研究,与遍布八方、不计其数的数字记忆项目相比,针对数字记忆的研究相对沉静,概念化、体系化程度均显不足。虽然大量记忆研究早已从媒介变化角度触及数字化进程,但所涉“记忆”含义十分宽泛,甚至将所有数字信息保存均视为记忆议题加以讨论,尚不足以构成数字记忆的专门学术领域。本世纪以来,一些以数字记忆项目为实践基础的政策理念和研究成果陆续问世,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对包含记忆资源在内的各种数字资源的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以“数字记忆:构建、认同与传承”为主题的数字记忆国际论坛是对数字记忆的第一次系统研讨,开场主旨讲演从理论上初步诠释了数字记忆的概念、背景、动因、特点和目标^[8],多国专家基于实践的研讨正在推动这一专门领域的形成、扩展和深化。

2 文化记忆,数字宫殿

2.1 数字世界的文化记忆

关于记忆,自柏拉图始先哲们多有精辟论述,记忆大师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定义比较通俗直接:广义的记忆“包括学习、保持、联想和复现”^[9]。再简洁地说,记忆就是“记”和“忆”的合体^[10],类似于“存”和“取”,在漫长的记忆认

知变迁中这个道理始终不变。本文所要讨论的数字记忆是脱离身体记忆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德·艾斯曼夫妇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日后不断丰富完善并得到各国文化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文化记忆涉及人类记忆的一个外部维度,或者说是“外部存储器”,“它可以使需要被传达的、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移到其中。伴随这个过程的还有转移(编码)、存储和重新调出(再次寻回)的一些形式。”文化记忆的重要特征是“与被现实化的意义相对的那些意义,被遗忘内容的重新提及、对传统的重建和被压抑内容的回归”,也就是“与时代不共时的结构”,“被升华加工之后的文化回忆”^[11]¹⁰⁻¹⁶。可以说,“记”“忆”合体,外部维度、文化意义、非现实性、加工升华、构建而成等特性使之区别于任意信息留存之泛指记忆的含义。

数字记忆是数字形态的文化记忆,携带文化记忆和数字信息的各种基因和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广义而言,用数字代码记录的人类活动信息都可以说是数字记忆,包括微博微信网页信息、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本文讨论的数字记忆则限定于文化记忆框架内,对象选择的的目的性和信息加工的特定要求导致有影响有规模的数字记忆大多以项目形式构建和存在。

2.2 新一代记忆宫殿

人类一直把“宫殿”作为记忆的隐喻,或许是因为它宏大、高贵、神秘、结构复杂。人类记忆进化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寻找和建造新的记忆宫殿的过程,早期的记忆宫殿理想是创建一种人脑记忆术,公元400年,奥古斯丁作出了人类记忆的存放地如同宽广宫殿的描述;公元16至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著书传播记忆宫殿法,试图用这种记忆术改善人脑记忆,影响中国文化。近代

以来,随着印刷、照相等技术的普及,人的记忆扩展到大脑之外的各种记录媒介,记忆宫殿的含义得到引申,经过选择、逻辑组织和专门方法保存这些媒介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成为人们观念中的第二代记忆宫殿。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宣称“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我们的记忆宫殿不是(也不可能是)像利玛窦所说的组织所有人类知识的‘人工示意图’,而是包含全世界记忆物的有机实物”^[12]。计算机系统强大的信息记录能力,庞大的存储容量和智慧的联想功能推动了新的记忆革命,记忆资源必然地转换为数字形态,人们在数字空间建造了第三代记忆宫殿,不仅“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13]。数字时代的记忆宫殿和其中放置的数字记忆都是史无前例的,“21 世纪的记忆宫殿比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记忆宫殿有更多的渗透壁面,……无论它们覆盖的物理疆域还是它们拥有的信息语料库,都比以往的记忆宫殿大得多”^[14],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2.3 数字记忆的特点

“文化的回忆空间的结构和性质主要是受它们的记忆媒介的材料决定的”^{[1]476},因此文化记忆研究极为重视媒介的承载效果,语言、文字、图像、地点、建筑、纪念物,以及图书文献、档案、诗歌戏剧都可以成为过往存在的承载物,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再现逝去的事实与体验。以数字信息作为媒介的数字记忆之风行正是数字媒介和文化记忆特性的感召所致,在数字信息系统存储量大,便于查询,便于传播,便于衍生多样产品以及文化记忆的普遍特性之外,数字记忆资源和平台还具有一些其他物质记忆媒介无法企及的特质优势。

(1)多资源互补。“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15]记忆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是众多遗忘中的“幸存者”;文化记忆之所以需要重构,是因为记忆在时间的侵

蚀下,在各种有意的排斥、屏蔽和无意的遗失、丢弃下,大多支离破碎,流离失所。所以榕小崧说,记忆“藏匿在历史的缝隙间”^[16],阿莱德·阿斯曼说,记忆艺术是“一种对于散落的残留物的细心搜集,一种损失情况调查”^{[1]417}。前数字时代针对一个客体的记忆资源纷杂散于各处,可能有几本书、几条新闻消息、几张照片、几份档案或史志记录、几封信札、几段口述等等,数字记忆打破了资源类型和保管体系的分割,只要与记忆对象有关,无论图书、档案、史志、家谱、影视还是口述,无论文本信息还是空间和物体信息,无论收藏于何人何处或散落于某一缝隙,皆可以数字形态汇集于特定记忆专题,拼接出尽可能接近真实完整的样貌。

(2)多媒体连通。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说明通过某种修辞描述,可以使人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上彼此打通或转移。“通感”既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在记忆上有充分表现。当你忆起家乡的景象、亲密的故友、最爱的物件、妈妈烹饪的饭菜时,昔日的形象、颜色、声音、味道、触感常常一起涌进身体,让你感受那份熟悉和真切,因此,文化记忆的构建需要用各种手法调动人的通感体验。数字信息是跨媒介的,可直接通达多种感官,比起语言修辞更易于引发通感效应。一段声音或视频比起平面文字更能把人带回当时的场景,运用 3D 影像、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链接事件当时的背景和社会影响,受众获取的记忆信息会更加丰富,身临其境感更加强烈。未来的数字信息甚至可能携带气味和触感,随着技术手段的丰富,数字记忆将产生任何单一媒介无法抵达的奇妙感应。

(3)迭代式生长。记忆再现的是一种断裂和消失,时间像河流一样不停歇地冲刷着曾经的一切,把它的碎片带向不知何方。人们不可能像捡到一个完整的毛绒娃娃那样得到一个地区或事件的完整记忆,这不仅是因为事实性信息的无边无际、不断增加和随处散落,还因为人们对于过去的认知也总在改变。就一个区域和

一个活着的事物的记忆项目而言,永远不可能达到“完成时”,只有在不断的累加中丰富记忆图景。同时,“记忆总是当下的现象,是与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17],“要仰仗不断的阐释、讨论和更新”^{[1]503}。“如果说记忆是关于过去的,那它同样是关于现在的。记忆是在当前这一刻产生的,由许多构成要素组成。如果不再需要那些构成要素,它便会瞬间土崩瓦解。”^{[18]7}构建或重构记忆的本质是对过去的反思性观察和表达,这个过程有赖于“当下”要素的加入,包括主体当下意识和拥有的资源。新事实新资料的发现,新审视新思考产生的观念,都会进入新的当下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主题的文化记忆都没有最终版,随时处于可更新状态。数字媒介的迭代性刚好适应文化记忆的这种特性,不同于一次定型的传统作品,它可以实时添加、补充、扩展、修正,也可以把原来的“版本”保留备查,数字记忆使文化记忆的构建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也有利于及时发布新的记忆资源,端本正源,拓展认知,接近真实。

(4) 开放式构建。文化记忆学者从不断言记忆的真实性,而是强调它的构建性,“记忆的这种重新构建的特性,可能使之变得不可靠。”^{[18]6}这种真实性信任缺失的原因很多,既然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外部存储器”,那么这个存储系统的不完备恐怕难辞其咎。无论是历代权势的刻意取舍,还是世事颠簸中的遗失散落,抑或是在时代集体无意识中淡出视线,任一“存储器”都有天然的残缺。然而,人类珍视记忆的初心是追求过往的真相,而不是切割或粉饰后的故事。数字记忆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构建,可以吸引公众不同形式的参与,获取前所未有的多元记忆原料和多元文化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主体资源和认知的残缺,丰富记忆项目的表达维度。新加坡记忆工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是项目的牵头方,与该项目保持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有218个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遗产机构、公共机构、私人实体

和社会公益组织等。他们还组织成立了181个志愿者记忆团队,帮助有困难的人去记录属于他们的记忆,同时每个新加坡人均可拥有一个账户来安放他们的记忆故事^[19]。该项目自2011年启动至今,8年多时间里获得各类社会组织和大众捐赠的记忆资源超过108万件,极大地丰富了新加坡记忆的资源数量和类别,引发广大公民的喜爱和共鸣^[20]。网络的开放性赋予数字记忆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可能,其构建性在充当真实性代偿的基础上力求向真实性靠近。

3 寻觅之旅,构建之道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说,“对社会记忆的科学考察最初可能只是一种寻觅活动,一个朝着历史意识的中间领域的活动。在英语中可以用制作历史(doin history)来贴切地表示这个领域。”这里的“寻觅”和“制作”侧重关于记忆的认识论,同时特别指出要“更加重视媒体对构建和塑造历史意识的作用”以及“继续跨学科地认识社会回忆和社会传承的方法”^{[6]8-9}。韦尔策的“寻觅”和“制作”与记忆“构建”多有相通之意,人类世世代代总会回头寻觅走来的路,那是我们的根与源,数字时代关于社会记忆的寻觅增加了新的内容和维度,制作也有了新的目标和方法,它最简单忠实的目标就是把数字时代飘零的记忆以有生命的形态留给永远的明天。因此,数字记忆不是为传统的文化记忆更换一个新潮“头像”,与千百年的记忆模式相比,这里的一切刚刚开始,有诸多特点和可能,却没有指南和模板,需要基于数字资源特性不断摸索创新。

目前的数字记忆项目形态多样,主体不一,背景复杂,表达纷呈,笔者无力提出全面系统的指导性理论方法,只能从领略国内外现有项目以及笔者团队七年多以来构建北京记忆和浙江千年古村高迁记忆数字平台的经历中梳理若干感悟体会。

3.1 项目类型

就已有数字记忆项目而言,根据记忆资源的呈现方式可以粗略划分为展陈型和叙事型。展陈型主要是将一定专题的历史资源进行系统化展示,以原生资源诉说历史,主办方承担资源搜集汇总、分门别类、真实性甄别、版面编辑等工作,类似于数字资源汇编或网上展览,美国记忆、佛罗里达记忆、台湾记忆等项目这种特性比较明显。叙事型则主要是在该专题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上,用数字资源体系化、逻辑化、叙述式地呈现客体历史,主体的理解认知、立场情感更鲜明地渗透其中,类似于数字著述或创作,中国记忆、新加坡记忆、北京记忆、香港记忆等项目具有较多的叙事特性。事实上,大部分项目都是这两种类型实现方式的复合,只是主体风格有不同侧重而已。展陈型项目也需要对记忆客体有一定的研究、解读、叙述和观念表达,叙事型项目当然也离不开记忆资源的梳理与呈现。

3.2 构建要领

不同类型的数字记忆项目在构建方法上不尽相同,综合上述两种类型之需要,项目的目标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编排展示、技术支撑是不可缺少的五个要领,不同的项目可在着力上有所侧重。

(1) 目标定位。即确定项目的功能、主体、形式、风格、受众、效果预期等。每个记忆项目都有大致的主题边界,比如一个区域、一个机构的记忆项目必然涉及该处所的人物、事件等,可能和某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专题内容发生交叉,需要在项目整体规划中有所梳理和设定。数字记忆的基本功能是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在线提取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资源采集、编码和长期保存等,后者包括展示和检索等,每个项目打算在各个功能上达到何种程度也要有所选择,其规范性、完备性和智能化程度都会直接影响该项目的功能实现。项目主体即主办方,要拥有构建记忆项目的强烈愿望和掌控项目资源的能力,大型项目,如国家记忆、地区记忆等需

要多种基础资源,包括不同专长人员、资金、技术平台、记忆资源等,需要若干相关机构的支持。如佛罗里达记忆项目由州档案馆主办,联合州图书馆、州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学院以及佛罗里达民俗博物馆共同负责,同时与十几家机构结为合作伙伴关系^[21]。缅因州记忆网汇集了超过4.5万件手稿、照片、剪报、视频、音频等数字资源,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主办方缅因州历史协会,其余来自270多家合作机构^[22]。因此,主办方要有相应的资源调集和实施协调能力,建立可行的合作机制。

(2) 文化阐释。旨在揭示和守护项目的灵魂,韦尔策所寻觅的正是记忆的文化框架与内涵。如果把数字记忆看作单纯的或主要是技术项目,就免不了陷入舍本求末、舍里求表之途,迷失记忆唤起身份认同的本来意义,技术的功用也得不到最有效的发挥。文化阐释是对记忆对象的理解、挖掘、考据、梳理和表达,是阐释者学识、情感、历史观与已有记忆资源的深度融汇,是每一个记忆项目脚本质量的基础,其题材选择、文化结构、呈现方式都将以此为依据。文化阐释是一个研究过程,首先要对记忆对象进行深入解读,弄清楚对象范围、历史背景、发展脉络、文化性质、结构和特点等,在这个过程中研读资源的广泛性和透彻性直接影响项目主体对记忆对象的了解程度。比如笔者团队做浙江高迁村数字记忆时,项目内容负责人研读了大量乡土资料,包括该村保存完整的逾千年家谱59册,对该村历史脉络、风土人情的了解让当地村民和史志人员叹服,在此基础上策划的记忆网站便言之有据,落地有根。面对或纷繁或残缺的记忆资料,文化阐释者还需要有开阔延展的思维,观察和分析记忆对象在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环境与人之间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穿过时间的迷雾,超越各种不同结论的局限,把今人带进旧时风物长廊,找到认同、信任与归属。对于大型记忆项目,如国家记忆、城市记忆等,这种思维延展就更为必要。

(3)资源整合。诗人北岛用一个“网”字诠释生活,经纬交织,包罗万象,对远去生活的记忆自然也是牵涉广泛,由来纷杂。重构文化记忆最重要的“原料”是与记忆对象相关的各种类型、以各种方式存在的资源,无论是正史、别史、杂史抑或野史,无论是图书、档案、方志抑或家谱、契约等民间资料,无论是文本、照片、影像、实物抑或口述资料,无论是现存的抑或用现代技术手段制作的资源,只要对记忆对象的史实考证、文化阐释与情形再现有参考研究价值,就要尽可能网罗汇集起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并提供给大众查考利用。如中国记忆项目非常注重多元资源整合,“整理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收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形成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23]。借鉴国内外数字记忆项目经验,有两类资源特别值得重视和补充,一是口述资源,大多是请亲历者讲述未经文字记录的经历或见闻,是个体鲜活的往事回顾,往往可以填补一些历史缺漏。如新加坡记忆由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负责采集口述资源,截至2017年已经收集了来自4100多人超过2.3万小时的口述历史记录^[24]。中国记忆的口述和影像资源总量超过1800小时,仅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截至2018年已采集和收集七个省区90多位受访者超过180小时的口述史料^[25]。二是场所、地点、遗址等空间资源,这是文化记忆中极为重要的媒介。早在2000多年前,西塞罗就提出了地点特殊的记忆力和联系力问题,他认为“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1]344}。阿莱德·阿斯曼也认为,地点对于文化回忆空间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巩固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1]344}因此我国学者张立群等认为,“重视记忆场所的应用研究,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26]目前,有关场所研究及数字重建大多以独立的“数字遗产”项目实施,侧重于针对重要

文化遗址或历史景观开展3D建模、虚拟现实制作等,较少顾及历史文化叙事,如罗马重生、数字圆明园、数字莫高窟等。各国现有的数字记忆项目中对于场所景观大多采用图文显示,较少使用数字重建景观资源。随着数字文化建设的深入,数字遗产项目和数字记忆项目对接、图文资源与场景资源合流并用将成为一种趋势,数字场景在数字记忆项目中有助于增强用户的历史沉浸感。

(4)编排展示。数字记忆的重要宗旨是传播,把经过文化阐释的过去传给更多人,传给后代。因此无论是展陈型还是叙事型,国内外每个数字记忆项目都巧思匠心,把零碎的记忆资源精心编排,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展示出来,实现记忆资源与大众的连接。影响数字记忆展示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三个要点不可忽视。一是记忆资源的科学存储、知识发现和充分共享。从四面八方汇拢的记忆资源中隐藏着许多久远的秘密和珍贵的信息,对不同用户有不同的价值,需要用科学方法管好用好。北京记忆和高迁记忆创建的“前站后库”架构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前站即面向公众的记忆网站,主要用于资源展示,供用户浏览,鉴于网站容量和大众喜好,通常只有一部分资源得以展示;后库是记忆资源的完整数据库,各类资源经规范加工后存储于此,供对该记忆对象有进一步了解意愿和研究兴趣的人查询。这种方式满足了用户对于记忆资源的不同需求,在后库中设计智能检索还可以打通各类资源的知识关联,从中获得新的信息和结论。有些数字记忆项目,如佛罗里达记忆、香港记忆等,对展示部分也提供了良好的智能检索功能,查阅起来非常方便。二是时空线索的呈现。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任何记忆都不可能脱离时空飘荡,所以记忆项目中关于时空要素的表达就不可或缺,成为诱发受众记忆感受的必要导线。根据记忆主题的情况,空间是可以固定或移动的点或面,时间则是一条或长或短的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时间轴或其他方式将这两个维度客

观、直观、美观地加以呈现,才能使数字记忆项目进入相应的时空背景。三是努力提升用户体验。在数字空间,用户非常在意体验感,栏目设计、资源呈现方式、内容丰富性、逻辑性、美感、沉浸度都直接作用于用户的接受度和心理感受。除了对内容的深刻理解之外,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可以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如元数据、本体、知识图谱等资源组织技术,可视化、多媒体、3D建模、动漫、游戏、VR、AR等数字资源呈现技术,网站资源的移动端适配,开发专门的移动平台项目等,针对不同资源和意义传递采用适当的技术会带来显著的加分效果和动人精彩。

(5) 技术支撑。文化记忆形态的变迁与媒介进化同步,数字媒介在极大地强化了文化记忆功能的同时,也带来对数字技术的绝对依赖,因此必须把技术支持融入数字记忆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从需求分析到系统开发再到日常运维,从资源采集、加工、保存到展示、检索。不同规模不同主题数字记忆项目的技术应用不尽相同,好在记忆原理和信息管理十分相似,最基本的都是存和取两部分,很多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和规范可以应用或借鉴,在此基础上针对数字记忆系统的特点加以补充和创新。数字记忆技术应用中以下两个问题特别需要重视:一是数字记忆资源的种类、来源、格式复杂多样,远超某一行业、机构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需要多种媒体和数据支持技术,统合管理的需求和难度不容小觑。二是数字记忆资源不同于一般行业或机构数据,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属性,资源背景、含义、关联以及用户需求都更为丰富,需要针对其知识特点考虑相应的系统功能和专用工具,应对记忆构建的叙事逻辑,处理和表达记忆资源的情感性、模糊性、时空嵌入、多媒体等特点。工具如图像识别、字体识别、纪年换算、古文断句等,如荷兰国家档案馆的记忆宫殿项目为历史档案的手写字体配备了印刷体文字自动转换工具,为用户阅读带来很大方便。此外,机器学习、数字艺术、游戏开发等在数字记忆项

目中也会大有用场,将数字技术嵌入历史文化和艺术表现中,成为数字记忆项目的鲜明特点。

4 图档博人,何以担当

记忆是一个多学科领域,集体记忆概念提出以后,涉及学科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扩展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关心记忆的人群也更加广泛。“接近记忆问题的渠道的多样性也表明,记忆是一个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占的现象。”^{[1]8}当记忆与数字手段结缘,关联学科更加广泛,新增如信息技术、数字艺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传播学等。在对国际国内现有项目的盘点中发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在这个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参与度、贡献度非常显著。国家级、地区级综合性数字记忆项目大部分由国家或地区图书馆、档案馆主办或牵头,如美国记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新加坡记忆由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牵头,国家档案馆是重要合作机构,佛罗里达记忆由州档案馆主办,州图书馆是重要合作机构,该项目获得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2015年创新奖。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12年启动中国记忆项目,建立了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图情档专业)等也开展了本地区的数字记忆项目,关于数字记忆的学术研究,图书情报档案领域的学者也是一支主力军。那么,这种现象的缘由何在呢?

4.1 使命使然

当代“记忆热”引发很多领域的关注和加入,“记忆机构”(memory institutions)成为最近几年来很多国家对负有记忆功能组织机构的统称^[27],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有关机构,其中图书情报档案博物等机构是记忆机构的当然主体,担负守护社会记忆的责任,在信息时代应时顺势地成为数字记忆项目的主要承担方。本世纪以

来,全球范围图书馆、档案馆等记忆机构都将保护社会记忆作为新的使命和愿景,2018年国际图联发布《全球愿景报告》,指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文化遗产和记忆的保护”,国家级图书馆投票将这一项排在所有愿景的第一位^[28]。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档案、知识与记忆”,201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的主题是“治理、记忆和遗产”。国际档案理事会2008—2018年战略愿景之一是:让世界各地的民众了解有效的文件和档案管理是保护人类记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2015年12月联袂30家省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发出《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指出:“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之所,抢救记忆、保存记忆是历史和时代交给我们——图书馆人的使命……要把记忆资源建设当作我们新的航线、新的田野去勇敢探索、辛勤耕耘。”“图书馆,应该成为记忆资源的汇聚之地、创造之地、传承之地。”^[29]2019年中国国家档案局确定的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新中国的记忆”。在这一使命的感召下,各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踊跃开展记忆构建活动,创建了很多很好的数字记忆项目。

4.2 资源使然

文化记忆抵御时间侵蚀的武器是记录和固化记忆信息的媒介及资源,或者说是把文化意义上的信息和资料转入其中的“外部存储器”^{[11]13},而这些资料和信息主要以图书、档案等各类文献的形式存在。一方面,这些文献把过去的事实和认知定格了,从刻写、印刷到数字代码,穿过时间和事件的风霜雨雪,把过去的故事诉说下去。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蕴含着深厚的社会知识和情感,而记忆从来就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同时就是知识和意义,扬·阿斯曼甚至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6]4},这些知识和意义有些来自构建者的理解和赋予,更多来自资源本身。这些资

源最集中、最安全的存储地便是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专业文化资源管理机构。此外,“裸资源”并不能满足数字记忆的应用,元数据著录、文献数字化及识别、知识组织与提取是各类记忆资源得以长期保存和便捷调出的基础工作,而这些工作正是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常规业务,相关业务人员便成为数字记忆构建的优质人力资源。这些机构向来被看作知识宝库,日积月累,愈益富饶,自身的职业认知和职能定位也愈益强化其知识和文化属性,本世纪在LAM基础上提出的GLAM(Galleries, 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即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概念^[30]以及基于知识社群的多机构融会议题得到广泛的呼应^[31],用自身收藏的丰富的记忆资源和信息加工组织能力构建数字记忆成为图档博机构和专业人员在数字时代开展知识服务、文化传承、连接用户的一片新天地。

4.3 记忆属性使然

关于文化记忆有不同的分类,阿莱德·阿斯曼关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划分比较有代表性和学术影响。功能记忆和一个现实主体或政治诉求相连,支持某种身份认同,为自己架设一个特定过去的建构,亦称为“有人栖居的记忆”。而存储记忆则相反,它没有与现实主体或政治诉求的直接关联,不是任何身份认同的基础,包容比功能记忆更多或不一样的东西,亦称为“无人栖居的记忆”^{[1]146-153}。两种记忆各有作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群体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无论是权势者或是弱势者,都会依据各自立场和诉求构建当下的记忆表达,站在“维护”或“颠覆”立场形成“合法性”或“去合法性”记忆,这些功能记忆从特定主体意识出发对记忆资源进行了筛选、保存和阐释,为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提供支撑。存储记忆的留存也会经过筛选,但不以特定主体及其诉求为根据,因此内容比较繁杂多元,包括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各种“残片”,可以将每个时代的功能记忆包含其中,提供对功能记忆进行补充校正的多

角度资料,在这个意义上也被称为“记忆的记
忆”。阿莱德·阿斯曼认为,只有功能记忆和存
储记忆之间的边界保持很高的渗透性,才会使
不断的更新成为可能,否则会出现记忆绝对化
和原教旨主义化的情况^{[1]154}。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图书、档案等文
献资源,既可以参与功能记忆的构建,又是存储
记忆的主要构成。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
化资源管理机构既可以主持功能记忆的构建,
又是存储记忆的宝库,“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保
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识”,所收藏的大
量资源并不直接对应特定主体的立场,与当下
的诉求和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这
些机构抵御着日常记忆中不自觉的对过去的遗
忘,还有功能记忆中有意识的隐藏”^{[1]154}。在
各类社会组织中,同时具有两种记忆支持功能
的唯有图档博等文化资源收藏管理机构,故而堪
当“记忆机构”之名。这种双支持功能可以保证
两种记忆之间的边界处于开放和高渗透状态,
可以为各类群体构建和校正功能记忆提供充分
的资源,也适宜主办大型数字记忆项目。作为
数字时代资源保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
识的功能创新,全球图档博机构在数字记忆建
构中的亮眼表现正是因应文化记忆之特点,肩
负应担之责,贡献应有之力。

5 小结

记忆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懈探索的奥秘,宏
大至天地时代,细微及民生点滴,它承载过去,
连接现在,伸向未来。我们为什么记住和遗忘,
我们又是怎样记住和遗忘,受到人的生理和心
理、社会制度和意识、文化积淀和氛围、记录媒
介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机理之深奥,
构建之繁难可想而知。在人类转向数字化生存
的时代,数字记忆方兴未艾,成为数字文化中
的一道美好风景,在这里,感性与理性交互,还
原与创作叠加,人文与科技融合,留存与传播
并行,具有大量的研究课题和广阔的社会效益。
2011年国家图书馆对中国记忆项目做出立意
高远的定位,即“新媒体时代以记录历史、保
存文献、传承民族记忆、服务终身学习为宗
旨的全国性文化项目,是图书馆文献采集、整
理、服务以及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职能的新
拓展,是图书馆变藏为用,加强文献整合与
揭示力度的新举措。”^[23]如今我们可以看得
更远。图档博人在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
创建积累宝贵的数字记忆文化资产的同时,
无疑也可以为实现自身职能拓展,升级知识
服务能力,融入社会建构与治理找到新机
遇、新路径和新航线。

参考文献

- [1] 阿莱德·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Assmann A. Culture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 [2]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 袁杰,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 (Mayer-Schonberger V.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 [3] 闫宏秀. 数字时代的记忆构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4):53-58. (Yan Hongxiu. The constitution of memory in digital age[J].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2018(4):53-58.)
- [4] Upward F, Reed B, Oliver G, et al. Recordkeeping informatics: re-figuring a discipline in crisis with a single minded approach[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2013,23(1):37-50.
- [5] 马费成. 数字时代不能没有“中国记忆”[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2):2. (Ma Feicheng. The digital age cannot live without “China Memory”[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2014(2):2.)

- [6]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 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Welzer H. Social memory: history, memory, tradition[M]. Ji Bin, Wang Lijun, Bai Xikun,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M]. Coser L A,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8] 冯惠玲. 数字时代的记忆风景[N]. 中国档案报,2015-11-19(3). (Feng Huiling. Landscape of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N]. China Archives News, 2015-11-19(3).)
- [9] 赫尔曼·艾宾浩斯. 记忆[M]. 曹日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Ebbinghaus H. Memory: 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M]. Ruger H A, Bussenius C E,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3.)
- [10] 白洁. 记忆哲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66. (Bai Jie. The philosophy of memory[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4:66.)
- [11]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Assmann J.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2] 特里·库克. 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 (Cook 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utch Handbook in 1898 [C]// Documents and Report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Archives Congress. Beijing: China Archives Press, 1997:143.)
- [13]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55. (Toffler A. The third wave[M]. Pan Macmillan Limited, 1981.)
- [14] 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等.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3. (Burdick A, Drucker J, Lunenfeld P, et al. Digital humanities[M]. The MIT Press, 2012.)
- [15] 罗新. 历史是遗忘之间的竞争 [EB/OL]. [2020-02-21]. https://www.sohu.com/a/319490369_563941. (Luo Xin. History is a contest between forgetfulness [EB/OL]. [2020-02-21]. https://www.sohu.com/a/319490369_563941.)
- [16] 榕小崧. 33年前的火灾:被记住的,被遗忘的[N/OL]. 新京报书刊周评,2020-01-16 [2020-02-22]. <https://xw.qq.com/cmsid/20200116A085MM00>. (Rong Xiaosong. The fire 33 years ago: remembered, forgotten [N/OL]. Weekly book review of Beijing News, 2020-01-16 [2020-02-22]. <https://xw.qq.com/cmsid/20200116A085MM00>.)
- [17]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M]. 黄艳红,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5. (Nora P. Rethinking[M]. Jordan D P,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18] 查尔斯·费尼霍. 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M]. 王正林,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Fernihough G. Pieces of light: the new science of memory[M]. Profile Books, 2012.)
- [19] 陈静. 全民参与式的新加坡记忆工程实施现状及启示[J]. 北京档案,2016(3):34-37. (Chen J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ll-inclusive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J]. Beijing Archives, 2016(3):34-37.)

- [20] Singapore Memory portal[EB/OL]. [2020-02-26]. <https://www.singaporememory.sg>.
- [21] 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 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 档案学通讯,2012(3):14-18. (Han Ruohua,Liu Tao,Fan Ziwei,et al. A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memory pro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12(3):14-18.)
- [22] Maine Network. Maine’s statewide digital museum,archive,and educational resource [EB/OL]. [2020-03-03]. <https://www.mainememory.net/aboutus>.
- [23] 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 项目简介 [EB/OL]. [2020-02-26]. <http://www.nlc.cn/cmptest/int>. (Experimental Website of China Memory Project. About us [EB/OL]. [2020-02-26]. <http://www.nlc.cn/cmptest/int>.)
- [24] National Library Board. What 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Oral History Centre do[EB/OL]. [2020-03-03].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what-does-the-national-archives-oral-history-centre-do>.
- [25]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把文化和历史记录并传承下去[N/OL]. 北京晚报,2018-04-19[2020-02-10].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451505.html>. (National Library’s China Memory Project;to record and inherit history and culture [N/OL]. Beijing Evening,2018-04-19[2020-02-10].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451505.html>.)
- [26] 张立群,杨安华. 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142. (Zhang Liqun,Yang Anhua.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spa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trend [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2018(6):132-142.)
- [27] Brown C. Archives and recordkeeping:theory into practice [M]. Facet Publishing,UK,2013.
- [28] 王会寨. 国际图联《全球愿景报告》解读与启示[J]. 图书与情报,2018(5):65-71. (Wang Huizhai. Interpretation of IFLA’s Global Vis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2018(5):65-71.)
- [29] 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1):110. (Proposal on the rescue and construction of memory resource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circle[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16(1):110.)
- [30] GLAM - 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 Museums. 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 Annual Conference 203 [EB/OL]. [2020-03-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0801224434/http://www.archivists.org.au/events/conf2003>.
- [31] Hedstrom M,King J L. On the LAM;library,archive,and museum collections i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knowledge communities[J/OL].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4[2020-03-03]. <http://www.oecd.org/education/km/mappinginnov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637749>).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2020-03-15)